

# 良知，作家的饭碗

□李鸣生



《震中在人心》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很欣慰。因为它让我想起汶川大地震，想起惊天动地、山崩地裂的那一幕，想起躺在废墟下的十万亡灵，特别是其中那两万多个花朵般的孩子和学生！正是他们，召唤着我三次冒险去了灾区；也正是他们，激励着我在4个月拼命写完了这部25万字的书稿。因此这个奖，与其说是富有良知的评委和为本书投票的37821位网友对我的一种肯定，不如说是送给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十万亡灵的一份安慰。

我个人认为，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同时也是备受争议、最具风险的一种创作。

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社会的挑战、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面对作家自身的挑战。它挑战的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现实最残酷的伤痕、权贵最阴暗的虚假；它挑战的是作家的人格与思想、良知与底线！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面对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是迎上去，还是回避躲闪，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但它挑战的不是我的胆量，也不是我的才华，而是我的良知！我当时的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四川是我的家乡，身为一个作家，家乡有难，避而远之，袖手旁观，岂有此理！何况，面对灾难，作家不应缺席；面对死亡，文学不该沉默！于是在良知的驱使下，我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去了灾区。采访团结束后，我又独自两次闯入灾区。其间，我曾强行冲进北川；我曾遭遇6.4级余震；我曾四次进入成都儿童医院；我曾五次进入成都精神病医院；我曾走遍灾区所有重点倒塌的学校；我曾与近千名家长在废墟上为死去的孩子过儿童节；我曾在雨中跪在数百个孩子的坟前泪流满面。尤其是我第三次去灾区，住在最偏远的红白镇的帐篷里，中午的高温高达42度，连体温计都能爆炸。晚上倾盆暴雨，帐篷潮湿无比。而且帐篷里苍蝇、蚊子满天飞，我只能左手驱赶蚊虫，右手敲击电脑。由于采访繁重，无法入睡，很快我便病倒在帐篷里，打了一个礼拜的吊针。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留下。在三次近两个月的采访中，我行程一万多公里，走访了数百个军人、医生、教师、护士、镇长、民兵，录下250多个小时的录音，记下40多页笔记，拍下了9000余张照片，经历了十多次山洪爆发和上百次大小余震，还掉了十多斤肉。

然而，一旦真正进入写作，如同面对一份从未见过的国际考卷，对我又是一

次极大的挑战——写什么？怎么写？这看似是一个纯粹的写作问题，其实仍是一个良知问题。良知是什么？良知是一个人天生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作家的饭碗，一个作家的底线。丢了这个饭碗，写作便失去意义；越过这个底线，就不能叫作家。因此良知告诫我，对汶川大地震的写作，必须是一次纯粹的写作；必须以诚实的态度面对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500万苦难的苍生、十万个被毁灭的生命；必须揭示灾难的真相和灾民的精神创伤；必须表达灾民的哭声与泪水、诉求与愿望！而不能回避，不能粉饰，更不能把鲜血变成美酒，把悲剧变成喜剧，把灾区变成秀场，把死尸变成活人！这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否则愧对废墟下的十万亡灵，也愧对全国数十万救援大军！尽管曾经埋葬了十万生灵的汶川大地震，是我们民族巨大的一次伤痛，伤痛之后到底能痛出一批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并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是，这场灾难确实给历史、给后人、给文学留下了太多的血淋淋的记忆，需要更多的作家以及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地震学家去思考，去书写。而我的《震中在人心》，充其量是对现实社会的一次即兴发言而已。

记得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过：“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我对这句话非常赞同。的确，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风云震荡、令人心潮澎湃的时代；我们面临的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动万分而又悬念迭起的中国。那么面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现实，我们到底是先“发言”再“唯美”呢，还是先“唯美”再“发言”呢？

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当然了，面对这个时代，尤其是面对现实，文学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可奈何的。在伟大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面前，任何作家都不过是个小学生，无法转动乾坤。正如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想去超过它。”尤其是在这个流行假话的世界上，真要对社会发点真言，还真不容易。

但有一点，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在任何生存环境里，坚守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坚守一个作家写作的底线。因为在我看来，作家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受苦难经受风雨的，就是来忍受孤独寂寞的，就是来探究真相说出真话的，就是来承担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份担当的。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宿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否则要作家干什么？就像医生，职责就是治病，至于能不能治好病、能治多少病，是另一码事情。但如果你连病人都不闻不问甚至视而不见，还当医生干什么？当年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当作家的声音呢？好像很稀少，很微弱。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以鲁迅命名的“鲁迅文学奖”，体现的应是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什么？是“横眉冷对”，而不是卑躬屈膝；是“俯首甘为”，而不是俯首帖耳。当今中国，不缺天才，缺的是良知；不缺奴才，缺的是人才；不缺作家，缺的是像鲁迅那样的斗士。但愿“鲁迅文学奖”能激励更多的作家，像鲁迅那样拿起笔来，挺直脊梁，直面社会，直面人生！



## 为伟大时代而感动

### 面对时代的承担

□关仁山



我搞小说创作，多是关注现实生活。但是，我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里，报告文学是与现实、与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时代的号角”称号。我创作过几部报告文学作品，比如《执政基石》《播火者》，还有这部获奖的《感动天地——从唐山到汶川》，都是描绘时代生活的。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创作这部书是我的必然选择。祭奠逝去的生命，生命是灾难中最应该珍视的，生命值得舍生忘死去维护，生命是奇迹和祈盼的源头。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生者承担了灾难的记忆。我想通过两场大灾难的对比，描绘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透视时代的进步。也许就是这样的视角，完成了历史与时代的链接。

前一段有个说法，报告文学创作是以回顾历史还是以反映现实为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题材上的争论，落实到创作上，应该考量作家拥有多少精神资源。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报告文学除了认知这个上层世界，还要深入底层百姓生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写什么样的题材？为谁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对报告文学来说，“写什么”，比小说里的“写什么”更为重要，因为报告文学特殊强调真实性。真实性不是单一的，它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独特、广阔和丰富，以及珍藏在庞杂事物背后的价值。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报告文学应该有强烈的时代表感、同步性和敏锐性。

时代感直接关联深入生活问题。我的理解，生活对于作家多么重要。作家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但这生活除了家庭、朋友和单

位很狭窄的生活，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柳青说过，作家如果脱离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靠着超然才能够打造出工艺品，而带着泥土气息的艺术之花，只能在土地上

培植。所以，这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抓住时代题材，深入采访，还要用慧眼去认识、发掘和提炼。面对时代，要有新的发现。发现生活中真正惊人的东西，在琐碎的生活中寻找震撼人心的故事。所以，我感觉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还辛苦，不仅要拥抱生活，还要解析生活。如果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就会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报告文学。

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作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又不能简单书写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现实生活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摆脱浮华和功利，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才能改变我们对时代生活简单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全国有那么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跟人家比，我在这方面有欠缺，还要深入学习和思考。

说到理论，又回到精神资源上来了。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抗震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可是，我们忘记了很久。汶川地震，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在灾难中怆然复活。32年前的唐山留下了抗震精神，今天的汶川，是对唐山抗震精神的深化，是对民族心灵的净化与强化。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仁爱中国，建设一个国内各民族相亲相爱、与世界和睦相处的礼仪中国。抗击灾难带给我们的精神资源，是在两次大灾难中，我们的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非常宝贵。是的，灾难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也许这是灾难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吧！在灾难的考验面前，在真、善、美的感召下，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反省自身，不断认识自我，不断提高自己。这样的改变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并且有如春雨润物，潜移默化地、长久地产生影响。这种精神能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在创作中常常困惑于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中，备感精神资源匮乏。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化的生活乐趣，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全部停留在这里，注定无法逃脱疲惫之态。有的作品，即便找到了英雄也是抗日的英雄，或是时过境迁的英雄。变革的时代对我们心灵有着强烈震撼，读者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实的平庸，崇高感、英雄气，永远是令人神往的。所以，我们的报告文学一定会在时代精神资源里找到灵感，从而完成时代英雄精神的挖掘与重塑！

### 全景式多角度地描写那场大战

□彭荆风



作家多数是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动的人物与事件来写作。

61年前，我参加的解放大西南战役，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军旅生活。那是完成全国解放、彻底结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一次大战。我作为战斗队伍中的一员，随军跨越赣、粤、桂、黔、滇5省，完全沉浸在那场大战的激昂氛围中，深深被那百万大军向云贵高原、巴山蜀水进发的磅礴气势，以及指战员们勇于拼搏的精神所感动；在充满胜利者的自豪感的同时，出于年轻文学爱好者们的敏感，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全景式描述这一大战役的文学作品，那肯定能给后人巨大启示；只是我那时太年轻，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兵，既无法全面了解战场形势，更不可能知悉运筹帷幄的将帅们高超的战略部署，只能把这一愿望深藏于心中；但那是一团火，长久炙烤着我；以后在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工作时，又看到刘、邓二位统帅的副手张际春将军指出的：“我们只会创造历史而不会记载历史，但人们往往是从记载的历史中去了解历史的。”更感到，作为一个部队作家有责任去记载、描述那场大战；幸运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队的各级指战员多数都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每个人都有一段独特的感受，和他们接触时有意无意都能获得许多素材，我对那场大战的理解也日益增加。进入新时期后，我决心把这一题材列入写作计划，也就更用心地去搜集素材、阅读战史、找人访谈，那场大战的

写（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好写难写之分，能否写好决定于作家的文学功底和对所写素材的掌握是否丰富，理解是否透彻）。因为这场大战役，战场宽，敌我人物多、战场内外事件繁杂；想要把那大迂回、大包围的高超战略战术的威力，形象、生动、真实地描述出来，就不能满足现有的素材，还得随着写作的进展过程，不断地去仔细了解、访查、分析、综合、筛选，哪些事情可以保留，哪些事情可以删掉，这是很需要用心斟酌，也得像军事指挥官那样细心地谋划全局，像应对每场战斗一样，耐心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同时还得注重艺术的描写，以加强人物、事件的感染力。我很赞同美国纪实作家们“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的观点，才能构成一部既具有史料性，又有着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纪实长篇。这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我国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中，更是不乏成功范本，我们应该好好运用。

我对这部自能“打动我们的心灵，激荡我们的血液”，给读者以鼓舞力的作品，充满深情，更不敢怠慢，所以这12年间，每年我都要用三四个月时间来修改，前后达10次，把书中600多个人物逐一描述、赋予他们的个性。这不断地增加删改，也是不断地加深我对那场大战的认识，从而能去粗取精，更趋完善。

人生有限，在我60年的文学生涯中，却有近八分之一时间在忙这一作品，虽然辛苦却充满了激情与愉快。我很高興能把这本《解放大西南》奉献给读者！

忽然想到，以鲁迅名字命名的鲁迅文学奖，诸种门类之中，大约惟独报告文学未得鲁迅生前垂范。他是全能型的作家：小说和散文杂文不必说了，那是新文学之翘楚；他虽不属于新诗作者，但其旧体诗大概却是毛泽东以外现代流传最广者；他的理论批评也是旗帜性的，且不说经他评说有多少文学新秀声名鹊起，单单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即开辟了中国的文类文学史的先河；乃至文学翻译，虽然有人质疑“硬译”，但在俄苏文学以及欧洲小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却鲜见比他献力更多。故而，以直接垂范来论，鲁迅毕生写作留下的唯一空白，似乎也只有报告文学了。

至于原因，实在是这种文体比较晚近。在世界范围，报告文学的出现一般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日益动荡复杂的现实，作为一种深度解读、揭示社会事件或现象，兼具新闻与文学两重特性的写作而崛起。而在中国，“报告文学”名目首度露面，以我所知是1932年阿英所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时，距鲁迅辞世，不过4年。倘若这文本更早几年引入中国，鲁迅会否一试，似乎并非全无可能。至少，我读他写于1926年的《纪念刘和珍君》，从字里行间，感到了某种类乎报告文学的笔意：“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可是，中国的报告文学，却是上世纪30年代始于文界，复因抗战的特殊情势而

### 发扬鲁迅精神

□李洁非



大获用武之地，显然错过了得到鲁迅亲自垂范的荣幸。

这里对鲁迅与报告文学之关系的溯源，乃文学史一点小考据，并非正题。正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尽管鲁迅未亲自用创作实践，指点我们如何从事报告文学写作，我们的写作却并不失去如何发扬鲁迅精神这样的主旨。或者说，发扬鲁迅精神仍然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反思并拥有的一种意识。

关于鲁迅精神，如果特别从文学方面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小杂感》《而已集》中说的两句话：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这两句含意不那么具体。但也正因有些抽象，我以为反倒是对文学创作的观点，说得更内在。他说，“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乍看，其意难道。以我理解，鲁迅强调的是，人的心灵倘若“干净”到全无杂念，大概也就失去了爱。如作家还存着“爱”、能够“爱”，对人生的体验，则无法处在“干净”的状态。他总要追求、总要抗争、总要究辩——言以蔽之，他还有所“爱”。

也有较为具体的表达，例如《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这样一段：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

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一种文学是凭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他将这两种文学，简称“对新的讴歌”和“对旧的挽歌”，他并不简单地厚此薄彼，认为两者都是社会现实对文学深深浸润、渗透的结果。他对当时中国文学感到不满的，正是“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创新的进行曲”。文学，根植于人生和社会，激于因现实未及理想而生的“不干净”感。在这情怀之下，文学肩起责任，鸣于史、鸣于世，“崭新的进行曲”也罢，“怀旧的哀词”也罢，总之，要在“社会向前走”的历程中留下某种刻度和标识。一个麻木于是非、辨不清真与假、不知道社会历史正确方向的人，既不能谱写“崭新的进行曲”，也无从吟出“对旧的挽歌”。我想，这应是报告文学创作之魂；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从鲁迅教诲中找到立场和尺度。

《生命的呐喊》的获奖，像一片灿烂的霞光，给我坎坷多舛的人生送来了一个美丽的黄昏。

我感谢评委，对一个小人物的自传给予了极大的首肯，使一名在文学路上跋涉了三十多年的老作家，登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对这部作品的首肯，也是对一个草根族，对一个底层人奋斗历程的首肯，对一个作家为维权而呐喊的首肯！我要感谢广大读者和网友，感谢出版社，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它使一个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的山野女子，走出封闭的世界，闯出一番虽然坎坷但却美好的人生。它使我的生命在文学中闪光。报告文学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使我一次次地燃起火一般的激情，创作出一部部作品！

谈到报告文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有改变傻子屯命运的村党支部书记，创建了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打死东北虎的元凶，还有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无论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物，还是罪大恶极的死囚，都曾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了他们非同一般的人生。每一次深入的采访，都对我心灵产生强烈的撞击，使我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思考。

去采访打死东北虎的偷猎者的母亲，老人泪纵横出的一番话令我至今难忘：“嗨，一只老虎被打死了，你们这么多人都挂念着，可俺们这些人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有谁挂念俺们？”去采访先进人物傻子屯的党支部书记许振中，当问到他的身体状况时，这位铁打的汉子却背对着我，久久不语。我从他微微颤抖的背影上，看出了他内心的苦衷。我采访他妻子，她哭诉出的一番话令我感到震惊。她几次想自杀，她的两个儿子都自杀过被抢救过来。许振中累倒了，肾小球肾炎，严重肝硬化，肝腹水，全身浮肿得像气球似的躺在医院大门口，却因缺钱住不上院。她攥着借遍全村才借来的50元钱，跪倒在乡亲面前：“求求你们快救救老许吧，他快不行了！”

我感到悲哀，许振中全家拼着性命改变了傻子屯，却无人来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了。很多人都摇过许振中这杆先进大旗，用他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大旗摇坏了，摇得只剩下一根旗杆，却很少有人问津他的处境。于是，我找到县委书记对他直言不讳，谈出许振中一家的困境，以及该如何对待劳模的问题，许振中一家因此而改变了处境。

在这篇《走过伤心地》的报告文学中，我呼唤人们要正确对待先进人物，不要利用他们美好的奉献精神，而毁了他们自身。

在采访著名心外科专家、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时，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从那么高的职位上提前辞职下来？他说：“中国的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我已经51岁了，再这样耗下去实在耗不起，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不如趁自己还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去建一所医院，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福音，干点实事，也算不枉活一生了！”他还说，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就拿心血管病来说，全国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每年仅能手术四五万例，只占百分之一二。

刘晓程说的话令人敬佩，更令人深思。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我赞扬了刘晓程的崇高境界，同时也揭示出中国医疗的现状，以及中国在世界医疗中的地位。

我去采访大兴安岭火灾中被逮捕的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据群众反映这是一起冤案。我立刻去找该省省委副书记，向他汇报案情。17年后，庄的冤案平反了。

每一次采访过后，我的悲悯之心呼唤着我的良知，正义感呼唤着我的责任。尽管我的呐喊微不足道，但是为了明天，为了作家的责任，为了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会遵循着良心的呼喊下去！